

柏夷《公元四世纪的一个道教世家——〈真诰〉英译第一卷》述评

吕鹏志 赵允嘉

美国著名汉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新著 *A Fourth-Century Daoist Family: The Zhen'gao, or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Volume 1* (《公元四世纪的一个道教世家——〈真诰〉英译第一卷》) 于 2021 年初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柏夷教授在同一出版社出版译著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早期道教经典》) 之后推出的又一精品之作。

除致谢外, 此书由导言和译文四章组成。译者在导言中首先说明了《真诰》的基本性质和研究价值。道教“三洞”经之首洞真上清经发端于东晋哀帝兴宁年间 (364–370) 在江南句容出现的一系列真人降授活动, 当地奉道世家许氏父子 (许谧、许翊) 礼聘的通灵道士杨羲声称有十多位真人向其降授了十几篇上清经、诸真传和零星诰示。南朝齐梁高道陶弘景 (456–536) 收集整理了杨羲和二许抄录的零星诰示, 增添了“三君在世自所记录及书疏往来”以及陶本人撰写的跋语“叙录”, 编成《真诰》一书。《真诰》与上清经、诸真传皆是上清经派教内文献, 反映上清经派既承传又发展了养生修仙的方士传统, 是研究早期道教信仰及实践的重要史料。因为《真诰》提供了上清经派道士修道的具体信息, 它不仅是解读上清经、诸真传的指南, 而且可与后两类文献互相印证和解释。译者指出, 因为《真诰》记录的是奉道世家内部秘传道教知识, 可以大大弥补《世说新语》和《晋书》等教外文献少有记载晋代社会宗教信仰的缺陷。《真诰》内容瑰奇, 语言典雅, 不仅是道教文学, 也是世界宗教文学中的奇葩, 其水平可与但丁《神曲》媲美。可惜现代学者对《真诰》的研究远逊于《神曲》, 迄今只有日本道教学者完整译注了《真诰》(参见吉川忠夫, 麥谷邦夫編:《真誥研究(譯注篇)》, 京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00 年版)。西方学者对《真诰》的英译由柏夷的老师司马虚 (Michel Strickmann)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导其先路, 后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莉莎白·海兰 (Elizabeth Hyland) 的博士论文对《真诰》卷一作了英译研究,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泰伦斯·拉塞尔 (Terrence C. Russell) 完成了有关《真诰》诗歌英译研究的博士论文, 柯睿 (Paul W. Kroll) 发表了有关《真诰》玄言诗的论文 (参见 Paul W. Kroll, “Daoist Verse and the Quest of the Divine”, in John Lagerwey & Lü Pengzhi,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Two: The Period of Division*,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0), 托马斯·史密斯 (Thomas E. Smith) 出版了《真诰》一至八卷的英译 (参见 Thomas E. Smith,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Part One: Setting Scripts and Images into Motion*, Three Pines Press, 2013 及 Thomas E. Smith,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Part Two: Instructions on Shaping Destiny*, Three Pines Press, 2020), 但均处在探索阶段,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如托马斯·史密斯对《真诰》陶弘景注的关注研究不够, 反而将读者引入歧途)。柏夷此书填补了西方道教学术研究的空白, 必将对《真诰》及中古道教研究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译者在导言中简要交待了《真诰》一书的主要内容, 特别指出常被前人忽略的两个事实。一是指出《真诰》中描述了许多地位崇高的女真, 且有女真与凡人同修“偶景”之术, 结成“神婚”; 而与之相反, 修习天师道“合气”之术的许氏家族女性却命途多舛, 死后也不得安宁, 惟有许谧之妻陶科斗有成为真人而迁入易迁宫的机会 (参见小节 “Women and Goddesses”)。二是通过将敦煌写本 S. 4314、S. 6193 和 P. 2751 所保存《登真隐诀》佚文中陶弘景对《九真中经》的注释与道藏本《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经》作对比, 译者推断后世道教徒曾对上清经、《真诰》和《登真隐诀》中涉及佛教的内容进行删改。再考虑到陶弘景本人对佛教的信仰, 译者认为佛教对上清经派的思想已经产生影响 (参见小节 “Buddhism in the Declarations”)。

译者还在导言中陈述了他与众不同的翻译策略及其理由。为方便现代学者更好地理解《真诰》, 译者重新编

排了《真诰》的文本顺序，根据陶弘景注中提到的互见文字内容，将分散在不同篇卷的同一事件或主题集中翻译。每一事件或主题均加上标题，并有简要导言予以说明。英译第一卷包括陶弘景后序、愕绿华诗、司马昱之子、“（从前卷有待歌诗十篇接戒来至此凡）八纸”等四章。

第一章陶弘景后序（Tao Hongjing's Postface），译自《真诰》卷十九、二十《翼真检》。本章为陶弘景整理编著《真诰》时所撰跋文，包括“真诰叙录”、“真经始末”和“真胄世谱”三部分，分别讲述《真诰》的内容体例、上清经的出世和流传情况，以及许氏家族的家谱与杨羲的生平。为便于读者理解，译者依据唐代贾嵩撰著的《华阳陶隐居内传》在本章导言中补充了陶弘景的生平，简要介绍了其为官、从陆修静弟子孙游岳学道、于茅山著书等事迹以及其同梁武帝萧衍间的交往，并进一步探讨了陶弘景对于佛教的态度。司马虚认为陶弘景的佛教信仰是在梁武帝崇佛的政治历史背景下，为保护其道教教团采取的策略，柏夷的观点则不同；王家葵将此视为是陶弘景受到梁武帝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柏夷的看法亦有异；柏夷相信陶弘景确实崇尚一种特定的佛教传统，但又否定其他类型的佛教。这一观点也表现在本书第四章对方诸岛相关内容的翻译上。

此外，柏夷还多次强调了陶弘景对上清诸真诰的推崇和信奉，如陶弘景称陆修静为了宣扬自己整理的古灵宝经而将杨羲手书的《灵宝五符》隐藏起来，说明陶氏将杨许手书的重要性置于其与陆、孙一脉的师承关系之上；又如陶弘景深信上清诸真对杨羲及许氏父子死后升真的预言，尊称三人为“君”。

第二章愕绿华诗（The Poems of Elühua）翻译了《真诰》开篇“得道女”愕绿华降授羊权（晋代书法名家羊欣祖父）之事，译者认为这部分内容专为引出此后一系列的降授活动，相当于“真诰”的前奏。本章涉及之诗、文与注释，原文虽不足五百字，但译者仍在导言和译注中详细剖析了其中隐含的信息，为读者理解《真诰》提供了极大助力。译者先指出杨羲并非当时唯一的灵媒，又通过比较羊权家族、杨羲及许谧家族的相似点，推测许谧可能利用杨羲所获诰授谋求升迁，而上清诸真的降授也正是在围绕相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身边的名士家族中展开的。译者也向读者强调了愕绿华因前世所犯之罪被逐出玄洲及告诫羊权不能泄露其消息两事。实际上，前世或家族成员所犯之罪及泄露天机之罪均与《真诰》中所描绘的死后世界紧密相关，这一点充分表现在陶科斗的死后经历上，柏夷上一部专著 *Ancestors and Anxiety*（《祖先与焦虑》）中已有详述。另外，译者还探讨和翻译了《三洞群仙录》及《云笈七签》征引的两段愕绿华诰语，可能是《真诰》的佚文，但不能确定佚文是被人删去的，还是另有源头。

第三章司马昱之子（The Sons of Sima Yu）节译自《真诰》卷八《甄命授》，译者选取了其中候王夫人、紫微左宫王夫人和云林宫右英夫人三位女真对于司马昱子嗣的预言。虽然陶弘景据此将众真降授杨羲的时间前推至晋穆帝升平五年辛酉（361），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在事后编造的预言，现代学者多对此表示怀疑，译者在本章导言中对此问题做了一些探讨。根据《晋书》中的相关记载，我们知道司马昱为延续后嗣多方卜问，也曾向许谧之兄许迈求助，这就使杨羲的叙述有了可信度。译者认为，虽然预言中的种种细节均可能为事后编造，但仍倾向于相信陶弘景的判断，而相比于预言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此事件总结出杨羲有别于其他灵媒的特点。首先，不同于只能沟通一位神明的普通灵媒，杨羲的沟通对象是上清经派的众多真人；其次，这些真人都有不同的声音，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提供不同程度的鼓励或指责，这使得杨羲既可以充当父亲的形象，又可以扮演明师的角色；最后，因其可沟通的仙真有男有女，杨羲能以其他灵媒无法做到的方式制造性别角色，比如他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演绎了许谧过世的妻子陶科斗的声音。

精确翻译这些预言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一方面，为了保证可以事后推诿和广泛流传，预言本就以神秘暗示的形式出现，难以为人理解；另一方面，仙真预言包含的道教术语往往拥有多重意义，也大大提高了翻译工作的难度。本章的翻译不仅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读方式，而且极好地展示了这些预言的神秘和复杂，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创造性的尝试。

第四章“八纸”（“Eight Pages of Lined Text”），译者将分散在今本《真诰》卷三、卷六和卷九中四段原本相连的文字，以及明宁献王朱权（1378-1448）所编《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关于“方诸岛”的一段陶注佚文重新整合起来，复原了陶弘景所谓“从前卷有待歌诗十篇接戒来至此凡八纸”。这四段文字记述了十一首诸真相互唱和的有待无待歌诗、汉明帝梦感神人佛现及佛教传入中土之始、自古即多有奉佛道者的方诸岛、源出佛教《四十二章经》的方诸岛“众灵教戒”。此外，译者还补充了紧随众灵教戒之后的数段类似文字。本章并非篇幅最长的一章，但却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章。据陶弘景注释可知，这四部分应源自同一抄本，虽然杨羲的笔迹只出现在最后，但陶弘景推测其内容均由杨羲所出。参考其格式，此“八纸”很可能是打算进献给东晋帝王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八纸”抄录的是与佛教相关的文字内容，译者对此的翻译和研究有力证明东晋中叶上清经

派已开始吸取外来佛教的教义和实践，修正了学术界普遍认为佛教全面深刻地影响道教始于东晋末刘宋初古灵宝经的旧说。

第一部分为十一首有待无待之诗，是右英夫人、紫微夫人等十位仙真讨论右英夫人与许谧间“神婚”是否合适的玄言辩论诗。除翻译外，译者还于每首诗后附有简要解读，点明仙真隐含于诗歌中的不同态度。后三部分在内容上紧密相连，均与佛教有关。首先是汉明帝之梦，记载了汉明帝梦神人而遣使求取《四十二章经》的传说，据陶弘景注“今既欲说小方诸奉佛，故先宜叙此也”，译者推断这部分内容实为“众灵教戒”之序，而陶弘景又含蓄地将方诸岛相关记载与之结合起来。其次是介绍方诸岛的内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小方诸岛上的“佛道”。译者根据汉明帝之梦段落中陶注“小方诸奉佛”及《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所保存陶注佚文推断大方诸岛西、东两侧的两个小方诸岛均自古即奉“佛道”，而在陶弘景眼中，方诸岛之佛教又优于从西域传入的佛教。译者以为，后世编辑者删去佚文是为了掩盖小方诸岛佛教信仰与上清经派旨趣相同的情况，以及杨羲的部分宗教实践与佛教相似的史实。接下来则为方诸岛诸真所作“众灵教戒”，其内容改编自《四十二章经》，杨羲将“佛说”改为方诸岛诸真人的诰授的，译者也相应按照佛经的格式重新划分了段落。虽然早已有人注意到这部分内容与《四十二章经》的关系，但译者指出，杨羲的改编是为了提供一个《四十二章经》的“启示版本”（revealed version），陶弘景也无意隐瞒此事。若能在《真诰》的语境下解读这些内容，更有助于理解四、五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接受。而道经中对佛教观念和实践的挪用，与其说是抄袭，毋宁说是整合佛教的尝试，实际上为佛教提供了进一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条件。通过杨羲模仿《四十二章经》创作的新章节，也能看出当时中国人求同存异的宗教观念。译者也提到，此时的道教不仅简单借用了佛教词汇，佛教的道德观念、获得智慧的途径、对死亡及死后世界的理解等均已吸引了道教的关注。最后，译者附上了与“众灵教戒”格式相似的章节，其中有两段文字收入了今本《四十二章经》。译者认为，这表明杨羲的抄袭有可能又反过来被复制进《四十二章经》的早期版本。

读罢全书，不禁感叹柏夷教授对中国中古宗教探索之深入。这一全新译本用词典雅，文义清晰，行文流畅，译者在翻译之外还做了大量校勘、注释等基础性工作，不仅为英文读者提供了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同样可以帮助中文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真诰》之内涵。译者充分借鉴了此前几种译本的精华之处，又较前人之作更加简洁精确。如规避了日译本中许多无助于理解的繁琐注释。又如“八纸”一章中有待无待诗歌的翻译，托马斯·史密斯将“我为有待来”译为 I am one whose coming depends on something（我是依赖某物而来者），而柏夷则将此句译为 Now I have come for the sake of dependence（今我为依赖之故而来），纠正了前者之误。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诰》所载诸真诰授的辞约旨隐，晦涩难明，译者的工作也难免有未善之处。比如在第二章愕绿华诗中，译者参考了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所译《文选》，认为“寥笼”、“蔚萧”等词是连绵词，并将“寥笼灵谷虚，琼林蔚萧森”译为 Thus faintly caged, the numinous valley is void, Its rose-gemmed groves dense and murmuring（灵谷因寥笼而虚，琼林密而簌簌作响）。但我们认为“寥笼”是形容“灵谷”空旷的比喻，而“蔚”与“萧森”二词均是草木茂盛之意，这两句诗的意思更可能是“灵谷如空笼般空旷，琼林中草木茂盛”。

又如译者在第四章“八纸”中关于小方诸岛“佛道”的理解上或欠妥当。前文已提及，译者认为两个小方诸岛均信奉“佛道”，其主要依据来自《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我们可以将其中相关段落与今本《真诰》作对比。《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作：

大方诸之西，小方诸之国，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图，以金玉镂之。或数百尺而层楼突起，其工人极孝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之精，日月之华，昼服日光，夜服月华，读夏《归藏》之经，用之以飞行。大方诸之东，小方诸上，多奇宝，甚灵异，有玉酒金浆在焉。青帝君畜积天宝之器物，尽在于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饮此酒浆，身作金黄色，常多吹九灵箫以自娱乐。能吹箫者闻四十里，箫有三十孔，竹长二三尺，九箫同唱，百兽拊舞，凤凰群至，鸣舞以和箫声。此国之乐也，与西胡之佛法大不侔矣。西胡之法，谓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其乐不同，况其法也。《涅槃经》云：生灭灭矣，寂灭为乐，是以生为幻，死为乐。方诸国以生为乐，死为患也。故称佛法，不称佛道。（出《真诰》。）

而今本《真诰》则为：

大方诸之西，小方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图以金玉镂之，或有高百丈者，数十曾（谓应作“层”字）楼也。其上人尽孝顺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读夏《归藏经》，用之以飞行。（按夏曰《连山》，殷曰《归藏》，与此不同。依如三弟子，虽奉佛道，不作比丘形服，世人谓在家真菩萨耳。）

大方诸之东，小方诸上，多奇灵宝物，有白玉酒、金浆汗。青君畜积天宝之器物，尽在于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饮此酒浆，身作金玉色泽，常多吹九灵箫，以自娱乐，能吹箫者，闻四十里，箫有三十孔，竹长二三尺，九箫同唱，百兽拊髀，凤凰数十来至，和箫声。

前者虽称引自《真诰》，但缺少西小方诸岛后“按夏曰《连山》……在家真菩萨耳”的注释，又在东小方诸岛后多了“此国之乐也……不称佛道”的内容。译者以为，后一内容应当是被道士所删陶弘景注，其目的在于隐藏上清经派的修行方式与“佛道”的相似。但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强调二者相似性的“依如三弟子”一句，仍保存在今本《真诰》中，即便后一注释的确是被故意删除的，也很难以此接受译者的观点。另外，两者都明显将大方诸之西小方诸岛信奉的“佛道”与大方诸之东小方诸岛信奉“道（原文作“佛”，疑涉下文“佛道”而误）法”进行对比描述，与敦煌写本P.2751所存《登真隐诀》佚文所谓“方诸者之境，奉之（指“佛道”）者半”相合，译者却认为东西小方诸岛俱信“佛道”，似难令人信服。

（作者吕鹏志，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允嘉，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夏德美）

多元视域与妈祖学术研究新进路

——《“一带一路”与妈祖文化传承发展研究》述评

黄永锋

近年来，民间信仰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各地政府纷纷推动民间信仰转型，挖掘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将其打造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名片。妈祖信俗于2009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发挥妈祖文化等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妈祖文化自其发生之时起，就随着历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传播到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开放性、和平性、包容性等多个特点。妈祖文化已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融入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人员交流联系的重要载体。这无疑为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与落实、推动海峡两岸经济文化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著《“一带一路”与妈祖文化传承发展研究》，是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妈祖文化传承发展，福建省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背景下完成的。该书为莆田学院首次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一带一路’与妈祖文化传承发展研究”的成果，今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成果对于贯彻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建设、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承弘扬妈祖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书分为中国卷（上）、中国卷（下）、亚洲卷、欧美卷和综合卷五册，总计100余万字，对妈祖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做了系统研究，对国内妈祖文化历史遗产与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妈祖文化变化规律及今后发展趋势，提出传承与保护策略，并调查发掘国外妈祖文化遗存，探讨全球治理视域中妈祖文化的独特价值。纵观全书，作者对国内外妈祖文化的产生、传播、流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兼具深度、高度和广度，体现了在多元视域中进行妈祖学术研究的新进路。

首先，该书翔实全面地反映了妈祖文化在国内的传播特点与发展现状。其中中国卷（上），从中国大陆妈祖信仰起源及其演变历程、妈祖文化传承模式、妈祖宫庙的分布类型及特点、妈祖文化的在地化发展、妈祖文化的主要影响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妈祖从人到巫、从巫到神的信仰发展历程。此后，在民间与官方的共同推崇之